

一针见血 >>

爱心经不起“分贝筹”测试

文 / 张立美

12月23日，一个名为“分贝筹”的爱心活动刷爆了微信朋友圈。不少网友贴出的照片显示，同一个受助的贫困学生，却在不同的生日界面中出现，名字也不同，甚至信息显示有贫困学生出生在2009年2月29日。“分贝筹”回应称，活动在测试阶段被工作人员发到朋友圈后传播开来，出现了信息错误和界面不稳定的情况，就此向公众道歉（12月24日《北京青年报》）

出现这种情况，究竟是否确实如“分贝筹”回应所言，只是在测试阶段信息录入错误，显然不能只听“分贝筹”的片面之词。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必须等到民政主管部门和受助贫困学生所在地政府联合介入调查之后，才能给出一个准确、权威的结论。

退一步说，就算确实是如“分贝筹”

所言，只是测试阶段的信息录入错误。但在客观结果上，仍会给大众一种欺骗人的感觉，让互联网慈善事业受到伤害。因为互联网慈善骗局太多，与“分贝筹”合作的深圳市爱佑未来慈善基金会，在前段时间联合腾讯公益组织的“一元钱购画”捐款活动就曾因信息不透明引起了社会争议。这些现象早就让广大网友的爱心变得非常脆弱，根本就经不起“分贝筹”的测试，经不住任何慈善活动有瑕疵的打击和伤害。

道理不难理解，既然“同一天出生的你”募捐活动处于测试阶段，那么就不该发布到微信朋友圈，不该直接对社会开放进行公开募捐，而应在小范围内测试，等测试成功后才开放。这是互联网基本准则，“分贝筹”研发者不可能不知道。而且，“同一天出生的你”募捐活动是在测试传播率，那么应该仅限于传播率方面的测试，而不该开放捐款通道，让网友可以直接

捐款。但对于这一切，“分贝筹”在测试阶段并没有公开表明还处于测试阶段，而直到被人踢爆同一名受助的贫困学生却在不同的生日界面中出现，名字还不同之后，才解释说处于测试阶段，这种事后的回应显然很苍白无力。最关键的是，不管是不是处于测试阶段，受助的贫困学生信息应该是真实的，而不能胡编乱造。

事实上，在互联网慈善事业快速发展的今天，在微信朋友圈满屏的“众筹求助”信息的当下，任何一项募捐活动要想脱颖而出，取得成功，获得广大的援助之手，除了要有十足的创意之外，更需要真实信息的公开透明，才能赢得网友的信任，才不会让大众的爱心和慈善事业遭受伤害。广大慈善平台、慈善机构，必须从“同一天出生的你”募捐活动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中国人的爱心实在是再也经不起测试了！

她时代观点 >>

性别正义，何以可能

文 / 肖爱平（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自从女性主义运动产生以来，女性主义者就对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挑战和批判。

在女性主义看来，主流正义理论以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二元划分为基本前提，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是男性以及男性特征，而与私人领域相对应的是女性以及女性特征，主流正义理论认同男性及男性特征，而排除和贬抑女性及女性特征。主流正义论几乎都以“普遍中立”的话语表达着男性的利益和体验，因而主流正义论是特权人——男人的某种信仰，这种信仰深入到正义理论的方方面面。

于是，女性主义从女性地位的视角出发，批判主流正义论中的男性霸权，并从各自不同的理论立场深入探讨了男女两性不平等的根源、实现两性平等途径等问题，以消除正义论中的男性霸权、构建真正能够容纳女性的正义理论为目标。

但女性主义的正义目标在究竟是追求差异还是寻求平等问题上陷入了困境。

支持“等同论”的女性主义认为，强化性别差异的“差异论”会巩固那种把女性看成是男性的天然依附者的模式，这等同于肯定了性别不平等的合理性，从而违背了平等的原则。

而在支持“差异论”的女性主义看来，以消除差异为代价的平等实际上是以男性为标准，这不仅改变不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反而使女性淹没在男性的世界中，因而同样违背了天赋人权的平等原则。很显然，忽视和强调性别差异的女性主义都无法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

因此，当代女性主义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能既肯定性别差异、同时又对统治女性的男权文化加以铲除？

主流正义论由于缺乏对占人类一半的女性的生存境况的关注，因而不是完善的，但女性主义者在正义论构建中如果缺乏对性别正义内涵的辩证思考，同样会使女性主义的正义理论陷入困境。因此，解决平等与差异的矛盾，需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唯

物辩证法。

对女性来说的理想正义社会的实现，必须以普遍平等的价值追求作为底线，但同时也不能排斥性别之间存在的某些差异，性别正义的真正实现需要一种普遍平等的正义要求和差异性的正义关照之间的动态、开放的权衡。从而，平等与差异之矛盾的解决有赖于社会从人的高度重视女性与男性的共同需求，并从性别的视角对女性独特性需求予以关注。

尽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在男女平等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现实生活中不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等领域仍然还存在不正义的现象，性别意识仍未真正进入决策主流，性别的正义在和谐社会构建中显而易见是缺失的。

在经济上，女性占有的社会资源和收入较男性而言居于劣势；政治上，女性由于政治参与的不足而无法有效表达其利益，从而使性别意识进入社会决策主流的步调缓慢而艰难；文化上，“男主外，女主内”以及“重男轻女”等传统落后的性别观念根深蒂固，从而成为实现性别正义的桎梏。

西方女性主义正义理论研究为中国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性别正义积累了独特的思想和经验，其目标不仅是要改变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命运，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女性的视角对已有的正义理论和知识体系进行全方位的质疑和挑战。

当然，中国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重点已不再是简单地介绍与引入西方女性主义，而是应该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的思想对中国性别平等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从而为我国正义制度建设提供理论的指导。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性别正义，两性平等及和谐发展是正义内容中的应有之义，中国现实需要的社会正义诉求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就是性别正义。因此，女性主义正义论批判和构建引起我们重新考虑女性以及与女性有关的问题，从而有助于解决当前中国性别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也能给予现实生活中的正义制度以巨大影响。

教育评弹 >>

“网瘾列入精神病”是一个警讯

文 / 钱凤伟

世界卫生组织将首次把游戏成瘾作为精神疾病列入明年发布的新版《国际疾病分类》。“围绕沉迷游戏可能导致‘游戏紊乱’甚至成瘾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世卫组织此举是在这一方向上迈出的坚实一步。（12月24日《每日经济新闻》）

谁都清楚精神病是个什么概念，如今游戏玩家基本上是年轻人，网瘾列入精神病，对他们今后的负面影响不可避免。但毋庸讳言，当因网瘾失去了正常的生活，不仅荒疏学业，甚至性格扭曲、六亲不认、残杀亲人，与精神病又有何异？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目前我国城市网瘾青少年约占青少年网民的14.1%，约为2404.2万人。尤其是这当中，还有400万未成年网民，他们才走上人生之路，竟因为玩游戏而患上了精神病，让人何等痛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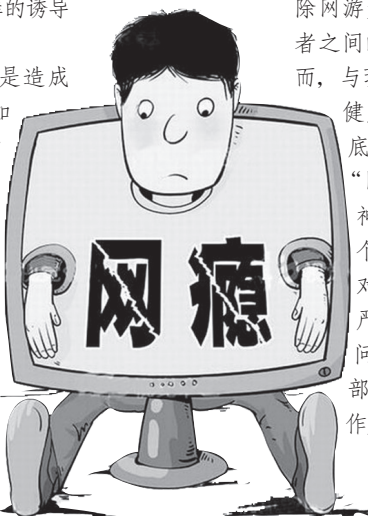
网游让人上瘾，固然是因为缺乏自制力，但更在于网游的成瘾性，而这也正是开发商借此赚钱的法宝。因此，为尽量延长玩家在线时间，游戏种种设定都是为了牵着玩家鼻子走，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大多注定要迷失在这样一个充满迷幻的虚拟空间。而网络游戏中的凶杀暴力，因为对玩家产生的强烈心理暗示和诱导，更已经成为现实犯罪的诱导唆使因素之一。

游戏管理的失序和混乱，是造成网瘾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比如防止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游戏的“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网游实名制，缺乏有效的落实。而2002年起施行的国务院《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不准通宵营业等规定，更早已成为一纸空文。于是，当现在一些网游打着“电子竞技”的幌子，沉迷游戏有了更名正

言顺的理由。

移动游戏被认为最有发展潜力。今年中国游戏市场规模将达到260亿美元，而2021年将提高到350亿美元。在未来5年内，中国游戏玩家数量和游戏营收将迅猛增长。显然，对网游行业监管的乏力，说到底是因为摆不正

网游产业发展与消除网游负面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然而，与玩家的身心健康相比，到底孰轻孰重？“网瘾列入精神病”是一个警讯，面对网瘾这一严重的问题，相关部门应该有所作为。



社会观察 >>

儿子偷老子被起诉是堂生动的法制课

文 / 汪代华

趁着父亲不在家，西安一男子竟撬了父亲的家门，将电视机偷走卖掉。因涉嫌盗窃罪，该男子已被提起公诉。（12月24日《华商报》）

长期以来，在我们有些人的意识中，总是错误地认为，“儿子偷老子不犯法”，或者老子偷儿子，家庭成员偷家庭成员都无所谓。甚至认为，首先儿子偷老子的钱是家务事，由家庭内部处理就行了，别人管不着；其次，儿子偷的是自家的钱，而不是别人的，没给社会造成伤害，最多让他父亲教训一下就行了。

其实这是糊涂的想法，大错特错了。儿子偷老子或者老子偷儿子，家庭成员偷家庭成员等偷自家的财产的行为也是违法犯罪行为。虽然是“自家人”，但盗窃没有“自家”与“他家”之分。“家贼”作案并不是“家务事”，而是违法犯罪的行为。我国的刑法虽然没有关于家庭成员和亲属盗窃的规定，但从我国的有关司法解释来看，家庭成员和近亲属间盗窃是可以构成盗窃罪的。

既然是盗窃行为，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时，《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偷拿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的

财物，获得谅解的，一般可不认为是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酌情从宽。如今一些老人和家庭成员因为害怕家丑外扬，往往老子被儿子偷了，或者被家庭成员偷了，一般不愿意报案，打落门牙往肚里咽。要给他们一个教训，让他明白，任何不法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俗话说，家贼难防，偷动物梁。“家贼”作案，只要家庭成员依法起诉，那么“家贼”也会受到法律惩处。面对家贼，完全可以依法维权，千万不要忍气吞声。儿子偷老子被起诉是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值得“儿女们”引以为鉴。